

17 亿 块 芯 片 的 喜 与 忧

7 月份,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集成电路产量达 530 亿块,相当于日均生产约 17 亿块芯片;今年前 7 个月,我国集成电路出口总额达 2160 亿美元,同比增长 99.5%,已超 2025 年全年 2019 亿美元的出口总额。

这组数据表明,中国集成电路产业正迎来新一轮高速增长。欣喜之余,我们仍需清醒看到行业隐忧。

喜从何来?三重因素催生产业飞跃。

全球市场行情提供了强劲动力。全球 AI 浪潮打开巨大市场空间,对存储芯片需求激增,存储行业迎来超级周期,存储芯片成为拉动出口增长的主力品类,产品价格大幅上行,带动出口金额暴涨。

国内市场规模厚蓄了成长土壤。我国拥有全球超大规模的本土应用市场,人工智能、汽车电子、工业控制等领域需求持续释放,为芯片产业提供充足的试验场与成长土壤,内外市场双向赋能,造就产销两旺的局面。

完整产业链带来了供给优势。从设计、制造到封装测试,中国集成电路拥有全球少有的全链条能力。28nm 及以上成熟制程芯片的中国产能全球占比已接近 30%,而全球 70% 的芯片应用需求都集中在成熟工艺领域。当海外巨头将产能重心转向高端 AI 芯片时,深耕成熟工艺、产能稳定可靠的中国厂商精准承接了这波全球刚需。

忧在何处?产业深层矛盾尚待破解。

技术壁垒与“卡脖子”风险犹存。尽管芯片产量与出口飙升,但高端芯片仍受制于国外技术封锁,关键材料、设备国产化率不足,产业链安全存在隐忧。

产业结构隐忧显现。当前产能增长主要依赖存储芯片与成熟制程,中低端芯片产能集中、存在重复建设问题,高端芯片产能不足、存在结构性紧缺。

人才与生态短板制约长远发展。行业人才缺口大,芯片架构师、AI 芯片专家、先进工艺整合师等顶尖人才更是奇缺,产学研用

协同创新体系尚未成熟。

国际竞争压力持续加剧。美国对华技术围堵不断升级,全球半导体格局重塑充满不确定性,出口高增长能否持续面临考验。

面对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格局,中国集成电路产业需从“量的积累”转向“质的突破”。

锚定高端,突破“卡脖子”瓶颈。要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把资源向关键核心技术倾斜,聚焦设备、材料等薄弱环节集中攻关,用好新型举国体制,推动单项技术突破向全链条能力跃升。

深耕应用,构建产业生态护城河。芯片的价值最终要在应用中兑现。应依托国内庞大的新能源汽车、AI 算力、物联网市场,构建上下游协同的产业生态,打通从技术突破到市场落地的“最后一公里”,以用促研,让中国“芯”在真实场景中迭代成长。

防范周期,增强产业韧性。半导体行业素有“牛短熊长”的周期规律。企业应避免盲目扩产、过度加杠杆。政府层面可建立产

能预警机制,降低周期波动对产业的冲击。同时,积极开拓多元化出口市场,减少对单一市场的依赖。

日均生产约 17 亿块芯片,是中国制造硬实力的有力注脚;出口金额 7 个月跑赢去年全年,更是产业升级的积极信号。在欢呼声中保持清醒,在繁荣期积蓄后劲,中国“芯”必将从世界工厂迈向全球高地,真正实现由大变强。



□ 本报记者 王明昊

视点

中国新闻奖专栏

职业本科,发展路上还有几道坎

职业教育,过去被不少学子视为升学路上的“无奈之选”。但近年来,多所职业本科院校录取线已与重点本科持平,甚至反超;北京科技职业大学 2025 年的招生结果显示,学校在河北、山东等京外 8 省本科投档线平均超本省本科控制线约 100 分,达到本省重点院校分数水平;深圳职业技术大学 2026 年本科(物理类)在广东省内录取最高分为 610 分,最低分为 571 分,超广东省本科(物理类)录取分数线 146 分。职业本科正成为不少高分考生的选择。

然而,当一批批职业本科毕业生满怀期待踏上求职路时,却频频遭遇简历石沉大海、报考公务员被拒的尴尬。我国职业本科教育还存在哪些问题、如何破解?记者近期进行了采访。

规模快速跃升

2019 年,国务院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正式提出开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同年 6 月,教育部批准首批 15 所试点学校由“职业学院”更名为“职业大学”,升格为本科院校。此后,职业本科院校数量快速增长,2024 年新增 18 所,2025 年新增 36 所,2026 年前 5 个月新增 37 所。截至今年 5 月,国内职业本科院校已达 124 所。

招生规模同步扩大。2023 年至 2025 年的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职业本科院校招生人数分别为 8.99 万人、10.96 万人、15.41 万人。2025 年职业本科院校在校生已达 51.83 万人。

“发展职业本科教育,是党和国家立足新质生产力培育、现代体系建设和教育强国建设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民政职业大学党委书记、副校长何振锋表示,一方面能破解人才结构性断层问题,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的培育和布局需要大量懂理论、善实操、能创新、会统筹的高端技能人才;另一方面有助于健全职业教育体系,打破职业教育学历“天花板”,构建起“中职—高职专科—职业本科”纵向贯通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此外,职业本科还能拓宽青年多元成才通道,为建设技能型社会夯实根基。

专业设置的变化同样折射出职业本科发展步伐。2026 年,教育部组织完成新一轮《职业教育专业目录》专业增补工作,新增职业本科专业 18 个。这些新增专业面向产业前沿、对接产业新需求,如在生产性服务业领域,新增技术经纪服务、低空运输工程技术等职业本科专业;围绕机器人工程技术人员、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员等数字职业发展需要,增补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车联网通信技术等职业本科专业。

天津职业大学教务处处长张小文认为,按照培养规划,职业本科学生不仅应具备比较系统的理论知识,还要掌握比较娴熟的技术技能,两者融合是其独特竞争力所在。“如果普通高校学生的使命是做从 0 到 1 的突破和创新,高职专科学生的长处是生产端的具体操作,那么职业本科学生的优势就是做从 1 到 10 的科研成果转化,并能在生产一线解决复杂的技术难题。”张小文说。

多重因素制约

在政策支持与社会需求的共同作用下,职业本科教育正由试点探索迈向规模化、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然而,随着一批批职业本科学生相继入

学、毕业,不少问题开始浮现。

社会认可度低,是发展过程中的最大阻力。采访中,多位职业本科在校生、毕业生都提到这个问题。“面试时我要花很多工夫向考官解释‘职业本科’与‘普通本科’是平等的。即使是这样,很多公司还是会因为我简历上‘职业大学’几个字而将我拒掉。”2024 年从河南一所职业本科院校毕业的小新说,他投出了 300 多份简历,仅收到七八份面试邀请。

偏见不仅来自用人单位,也存在于招生环节。“我们在招生时,有家长会问将来学位证书里会不会写上‘职业本科’等字样。”张小文说,这种顾虑反映了社会对职业本科认知偏差依然严重。

“‘重学历,轻技能’的传统观念也是发展的阻力之一。”何振锋直言,尽管法律上已经明确职业本科与普通本科是同等重要的教育类型,两者具有同等效力,但报考就读职业本科院校仍被许多考生和家长当作考不上好大学的退路。

办学定位模糊、资源保障不足、制度制约,也是发展中的堵点、痛点。

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学副校长方泽强认为,部分职业本科院校存在与普通教育趋同的倾向,办学缺乏特色、师资力量薄弱、课程安排不合理。

何振锋表示,产教融合深度不足,一些企业在与校方合作办学上缺乏动力,导致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出现“学校热、企业冷”的局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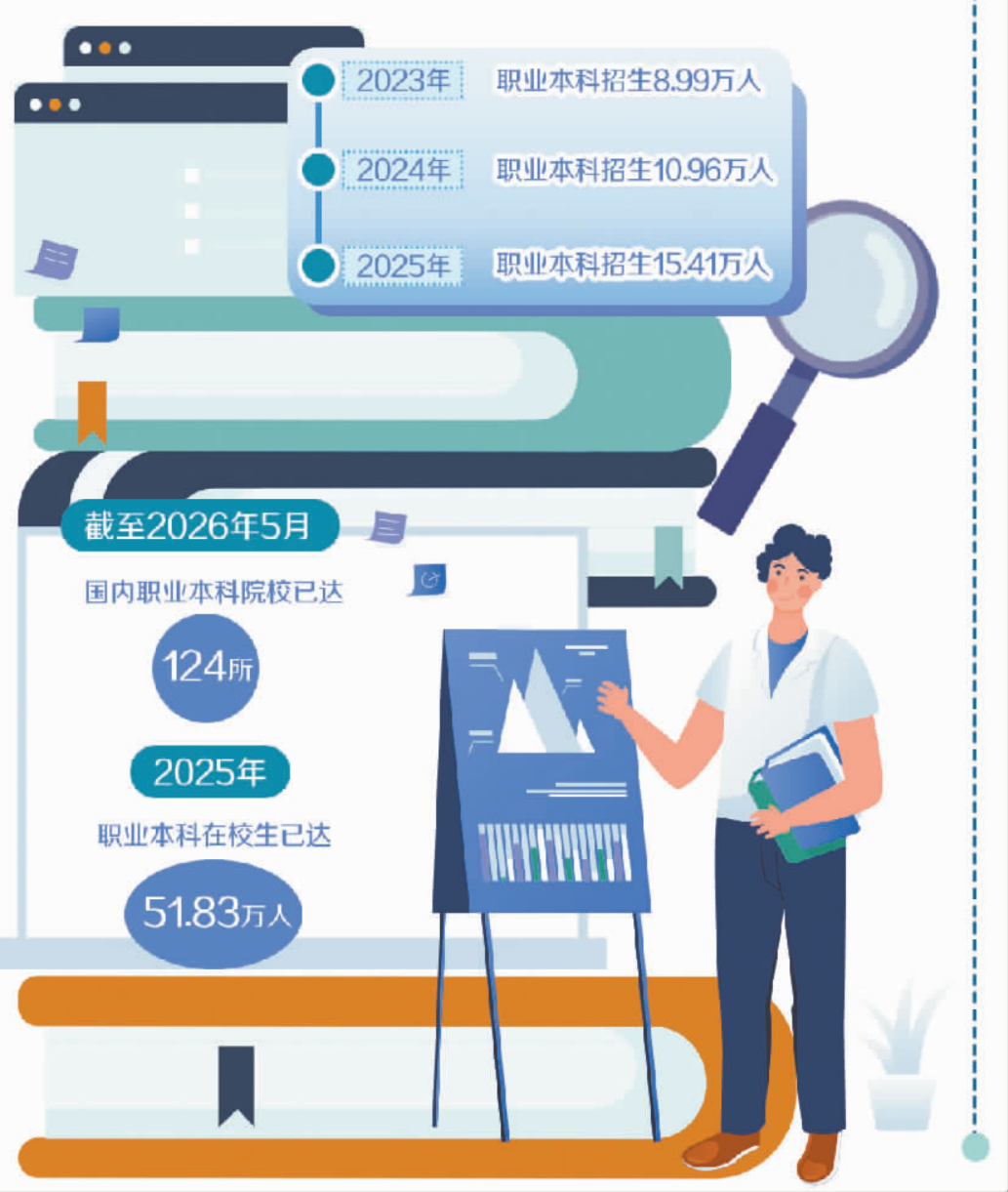
张小文表示,专业设置与产业迭代存在“时差”——产业升级速度飞快,而院校调整专业、更新课程、培训师资均需周期。“如何保持教学内容与产业前沿同步,是职业本科发展面临的持续挑战。”张小文说。

“升学就业的制度接口不畅通。”一位在职业本科院校电气工程及自动化专业就读的学生告诉记者,虽然自己所学专业与普通本科的专业相同,但一些地方公务员招录考试中并没有录入职业本科的专业代码,导致毕业生在报名环节即被筛除。”何振锋认为,这不仅削弱了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同等重要的法律公信力,也使得职业本科人才培养成果在出口端受阻,客观上强化了社会偏见。

亟待协同破局

职业本科教育是一个年轻的教育类型,在很多方面没有现成经验可遵循。受访专家普遍认为,需要政府、高校、企业协同发力,不断优化外部环境、提升办学水平、深化合作交流,助其走好高质量发展之路。

针对社会上普遍存在的“轻技能”观念,方泽强建议,应该持续优化社会环境,加强政策宣传,营造理论性人才与技能型人才同等重要的社会氛围,切实提升技能型人才的社会地位与待遇。“可以在中小学阶段开设



职业体验课程,为学生树立‘一技之长’观念。同时,落实提高技能人才待遇政策。”方泽强说。

提高职业本科的地位和吸引力,还应完善制度细则,打通制度堵点,消除隐性门槛。何振锋呼吁,将职业本科专业名称、代码及时纳入公务员招录、事业单位招聘、研究生考试以及职称评审等专业目录,确保职本学生在报名环节“有门可入”。在此基础上,还应加强督察,确保职业本科与普通本科毕业生享有同等地位。

在提升职业本科办学水平方面,受访专家认为应从内外两个角度发力。

从内部来说,职业院校本身要找准办学定位,遵循“办学方向不变、培养模式不变、特色发展不变”的政策要求,避免出现“去技能化”倾向。“要坚持以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高端技能人才为目标,在办学上宜精、宜专、宜特,不宜盲目铺摊子。”张小文说。

从外部来说,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是做好职业教育的基本路径和必要支撑,要破解产教融合中“校热企冷”的问题,激发企业内生动力,让企业真正尝到甜头。

何振锋建议,简化产教融合型企业的认证和优惠办理流程,落实金融、财政、土地、信用等组合激励政策。同时,建立国家级、省级产教信息共享、对接平台,帮助职业院校及时根据产业发展趋势调整专业设置和课程安排。“平台可定期发布产业需求、人才缺口、专业预警等信息,指导职业本科院校前瞻性地调整专业设置,实现人才供给与产业需求的精准匹配。”何振锋说。

求真

白血病还是“不治之症”吗

本报记者 吴佳佳

长期以来,白血病被贴上“不治之症”的标签,一旦确诊白血病,患者及其家属常陷入绝望。白血病还是“不治之症”吗?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主任医师张晓辉表示,随着现代医学诊疗技术不断迭代升级,白血病早已实现可治可控、多数可治愈。

白血病分为急性白血病和慢性白血病。急性白血病起病急、进展快,病情凶险,主要包括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和急性髓系白血病两大类;慢性白血病进展相对平缓、病程绵长,多以为发展周期,早期症状隐匿,主要包括慢性粒细胞白血病和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两大类。

从临床诊疗实际来看,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的治疗已迈入慢性病管理时代,与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一样可长期管控、实现临床治愈。张晓辉介绍,以往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治疗难度大、患者病程长、身心痛苦显著,预后效果较差。而随着靶向治疗药物全面普及、临床方案持续优化,绝大多数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患者病情可得到完全控制,治愈后能够正常回归工作、生活,重拾高质量生命状态。

既往最为凶险、致死率较高的急性白血病,如今也实现了诊疗技术的跨越式突破。张晓辉表示,依托精准化治疗方案迭代、靶向药物普及、造血干细胞移植

近日,平台经济“破卷向善”第二次协商对话在北京召开。北京、上海两地市场监管部门围绕外卖骑手算法优化,组织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 3 家平台共商共治。3 家平台表示将骑手等红灯时长在考核时间中顺延,在北京市朝阳区、通州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的部分区域率先试运行。

随着即时配送规模不断扩大,如何平衡配送效率与交通安全,成为平台治理的一项重要课题。单纯追求“速度”,最终会把压力传导到骑手的交通行为上。如果把正常交通等待纳入规则,则有助于形成“守规矩不吃亏”的预期。

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聘副教授阎天认为,等红灯属于骑手难以控制的正常交通等待,由此产生的配送延迟不应全由骑手承担。实时数据让配送规则可以根据具体订单、具体路况进行调整,本质上是把一部分时间掌控权还给劳动者。

美团外卖骑手“红灯停表”功能在北京上线后,骑手感受明显。朝阳区骑手刘建表示,有些路口一个红灯就要等 180 秒,一趟配送不只经过一个路口,等待的时间都要从后面的配送环节追回来,时间压力之下,容易产生焦虑。如今,“红灯停表”让等待变得可计算,骑手不再因遵守交通规则而担心配送时间被压缩。

美团“红灯停表”北京项目负责人杨晨光表示,骑手停下来等待的每个红灯时长都会被累加计算,多笔订单的等灯时间也会重复累加。补时按照实际经过的路口和等待时长计算。针对骑手提出的实时显示累计补时、增加语音提醒和配送主页面入口等建议,平台将进一步评估优化,并完善异常反馈机制。

一个路口的补时只是起点,配送全链路仍需持续改善。商家出餐慢、导航地址不准、写字楼等电梯、小区进门和临时交通管制,都是骑手普遍面临的堵点。对此,相关专家表示,“红灯停表”的意义不在于功能本身,而在于提供新的治理思路。要把配送过程中各种不可控的因素逐步识别出来,用更加精准的数据重新计算时间,再通过规则调整来分配责任。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教授陈龙认为,“红灯停表”是一个很好的起点,也具有行业引领意义。把合规等待时间纳入配送规则,是更规范、更人性化的做法,也有助于推动行业形成更加重视安全的共同标准。

“红灯停表”会不会让外卖变慢,也是消费者关注的问题。实际上,相较一味追求更快,消费者更需要准确、可预期的送达时间。美团方面表示,将梳理骑手提出的时间堵点,并探索向消费者展示骑手正在等灯的状态,减少因信息不对称产生的催单和误解。

“其实,‘红灯停表’调整的是平台对骑手的配送考核时长,而非消费者端看到的预估送达时间。”杨晨光解释,在此前的预估送达时间里,已包含城市特性、分段保护、配送距离等时间保护估值。

“我们今年还计划在 200 余个城市开展不闯红灯正向激励,为遵守交通规则的骑手提供奖励。”杨晨光说,平台接入交管部门数据后,结合骑手位置、行驶轨迹和订单状态,识别骑手的确在路口等灯的累计时长并自动顺延配送时间,让骑手不必因等红灯而焦虑赶路,有助于提升骑行安全与配送体验。从已上线数据来看,多数消费者体验不受影响,部分骑手接单量有所提高。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讲师束开荣认为,数据对接让政企协同从抽象概念变成可以运行的机制。“通过政府提供合规、准确的数据接口,平台将公共数据转化为具体产品和配送规则,共同解决了单靠企业算法难以应对的复杂治理与服务难题。”束开荣说。

本版编辑 李苑美 编 王子莹
来稿邮箱 jrbgzb@163.com

